

学人心语丛书

王春瑜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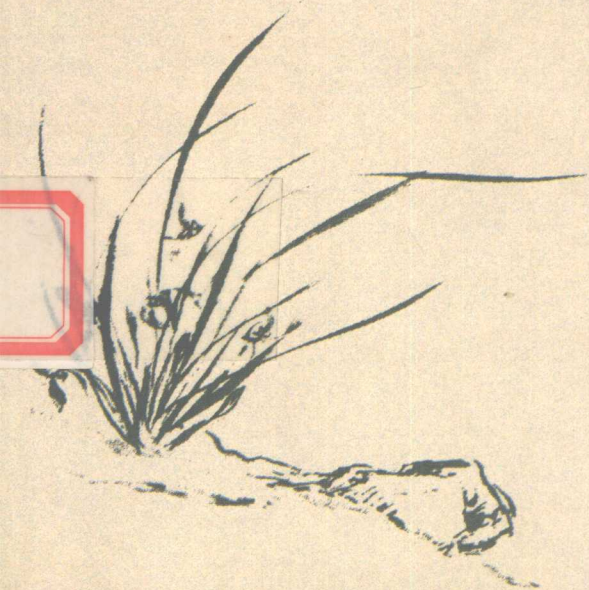
观中日月

雷

颐 /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明朝末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人来华传教时遇到不少障碍，首先就是用三棱镜、自鸣钟等中国人从未见过的奇巧之物打通一些重要「关节」。由于传教一直受到限制，他们便长期以「合儒」传播近代科学知识……



国中日月

学人心语丛书

王春瑜 主编

雷颐 /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责 编:冯 昭
复 审:宁志荣
终 审:张继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中日月/雷颐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2.1

(学人心语丛书)

ISBN 7-203-04478-5

I. 图… II. 雷…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8888 号

图中日月

雷 颐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 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25 字数:150千字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

ISBN 7-203-04478-5

I·1134 定价:10.00元



雷颐，祖籍湖南长沙，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中学毕业后到农村插队数年，后参军当兵，复员后到工厂当车工。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1985年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结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曾任《近代史研究》副主编，现为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和知识分子研究，发表研究论文数十篇，著有《萨特》、《取静集》、《经典与人文》、《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雷颐自选集》，译著有《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胡适与中国现代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等。

目 录

●
雷

颐

《图中日月》

洋人的膝盖和女人的马桶 / 1

图中日月 / 4

“公园”的意义 / 7

“赛先生”旅华记 / 10

大众的历史 / 14

听取“哇”声一片——戏谈语言的
权利 / 17

“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甲午战
争与戊戌维新 / 19

“去塞求通”——维新时期的报刊
与学会 / 22

新旧较量——维新的挫顿 / 26

“鬼子反重于祖宗乎？”——维新
运动失败的文化因素 / 31

“臣不得不死”——封建专制下的
君臣关系 / 34

最后的丧失

——清末新政的失败 / 43

“一蓑烟雨任平生”——郭嵩焘的
命运 / 52

梁启超的现代意义 / 61

文化碰撞中的畸变者——漫话辜
鸿铭 / 74

汉奸的“理直气壮” / 80

文章千古事 / 84

麻雀与曹操 / 87

法治的艰难历程 / 95

“可如实回答” / 103

“私人叙事”与“宏大叙事” / 105

补史之阙——《沉雪》的历史学意义 / 109

花开根生处 / 115

学术、文化与人的命运 / 118

“学术泡沫”和“正派女人” / 121

为时代作证

——读《邓小平时代》 / 123

时代阅读与个人经验 / 130

是是非非话卢梭 / 133

文人的激情 / 138

瘟疫

——法西斯的“魅力” / 142

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 / 153

夜半铃声 / 155

爱伦堡的困境 / 157

帽子和思想 / 162

洋人的膝盖和女人的马桶

□ 图中日月

中国传统向以“天朝上国”自居，以为自己“居天下之中”，外邦不是“狄”就是“夷”，不是“蛮”就是“戎”，总之离中国较近的是被华夏文化教化的“熟番”，离中国较远的是难以教化的“生番”。在这种观念主导下，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非常有限，甚至荒唐可笑。因此鸦片战争爆发时，对“英夷”自然所知无多，也就很难提出得当的应对之策。

在满清大员中，林则徐无疑是少有的开明之士，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可以说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的代表。而从一些细枝末节，便可窥见当时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程度。自从乾隆年间英国来华使臣晋见皇帝拒不行跪拜之礼后，对此便有种种说法。一说英国使臣见到中国皇帝后慑于“天威”，不由自主双膝下跪；另一种说法是洋人的膝盖与中国人不同，根本不能弯曲，所以才没下跪。鸦片战争爆发时，有人想起这第二种说法，信以为真，因此提出“红毛番”虽擅海战，但由于膝不能弯，不擅地面战争，所以中国军队只要多准备些长竹竿即可，两军相遇时用竹竿将英人捅倒，他们便很难爬起来，中国军队自可轻易取胜。这种说法，对林则徐亦有相当影响。当然，他并不相信英国人是天生的膝不能弯，而是他们腿打绷带使然。在战争爆发前夜，他认为“夷兵除枪炮之外，

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林则徐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难想见。如当时的名将杨芳，因多次镇压农民起义和边乱而被封为“果勇侯”，于1841年作为参赞大臣随靖逆附将军奕山赴广州防剿英军。他到广州后，认为英舰在水上浮行却几乎炮炮皆准，命中率反远胜于清军在陆上固定的炮台，其中定有某种邪术。他相信妇女所用的秽物最能“以邪破邪”，故想出妙计，搜集许多妇女所用马桶载在竹排上，在英舰来时出防炮台。结果当然未能“破邪”，炮台为英军所破。当时有人赋诗曰：“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兵家常识，战争双方无不想方设法了解对方的情况。但在近代中国，这条“常识”却不适用，或者说不准用。

身处与“夷人”作战前线，林则徐当然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夷情”，聘有专门的翻译为他译介有关情况，编译成《四洲志》，对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绍，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外部世界的著作。1842年至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更详细的介绍，特别是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更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鸦片战争，终使林则徐等对外部世界有了初步、客观的了解。

但像林则徐、魏源这样为了解敌情而编的《四洲志》、《海国图志》反而被视为大逆不道，认为“知夷”、“悉夷”本身就是罪过，“堂堂天朝”岂能去了解那些“蛮夷之邦”？因此他们不得不为这种为“制夷”而“知夷”、“悉夷”作出种种辩解。但也因为这种不畏浮议、敢于面对现实的勇气，林则徐被后人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仅仅“知夷”尚且如此，他们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策，必将遭到了更加严厉的谴责。

对现实的回避,其实只能使现实更加严酷。

结果,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去后却在那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日本朝野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可以说,这部著作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部旨在启发中国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却在异邦大受欢迎,启发了异邦的改革,并反过来不断侵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是中国的悲剧。

在随后的岁月中,“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简单几个字一直引起激烈争论,但双方对“制夷”这一目的则并无异议。所以这种种流派不论彼此攻讦如何激烈甚至于你死我活,无论是坚守“夷夏之防”还是主张“彻底夷化”,目的却都是为了“救国”,因此本质上都可归于广义上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但不无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只将那些严守“华夷之辨”、反对“师夷长技”者视为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对“师夷长技以制夷”,则抹去其“制夷”的目的然后便扣以“变夷”、“媚外”、“崇洋”、“卖国”、“殖民”等大帽,使其居于道德/政治的绝对否定性境地和劣势地位因而最多只有招架之功,进而自己再倚道德/政治的优势地位对其作义正辞严的攻击或批评。这样,在近代思想概念的流变中,所谓“民族主义”便常常带有相当程度封闭排外色彩,实际应称为“狭隘民族主义”。近代历史表明,这种“民族主义”却偏偏又对中国真正的繁荣富强起了巨大的阻碍作用,实际误国匪浅,为害甚烈。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和相当的警惕。其实,近代中国的些微成就,终未亡国,恰是那许多承认洋人的膝盖和我们的一样可以弯曲、女人的马桶并不能“避邪”,因此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不同内容地主张“师夷长技”的有识之士不惜负重谤而努力奋斗的结果。

图中日月

地图是我们对周围世界的反映，但这种反映并非完全被动的简单复制，而是充满了我们的选择，实际也是我们如何“看世界”的反映。恰如人所说：“地图并非与文化分离，相反地，它是文化的一部分。因为我们作为沉浸在地图中的族类，地图的历史就是我们的历史。”（〈美〉丹尼斯·伍德：《地图的力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在中国传统的“世界观”中，中国是位于天下之中的“天朝上国”，其余都是位居边缘的蛮夷之邦。明清之际，曾有传教士将现代世界地图介绍进来，但由于不合“天朝”图式，未被接受；而相信并宣传此图的徐光启等，则长期受到诽谤。鸦片战争后，在战争中曾与“英夷”交战、后又与西人交往颇多的福建巡抚徐继畲，认识到“世界”并非如传统想像，经过广泛搜寻之后，编著了介绍世界史地政经的《瀛环志略》一书。书中收有四十二幅地图，其中只有一幅关于日本和琉球未用西方地图，其余都按西方原图描摹。这是几百年后再次将西方制图学引入中国的一次尝试，在当时可是大胆的“非法”之举。在这样的世界图式中，中国位于“世界之中”的神话自然破灭，必难为世容。因此，徐继畲在初稿时明确写道：“亚细亚以中国为主”，但定稿时不得不改写为“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

相反,起初介绍俄国为“宇内第一大国也”,后改为“外夷第一大国也”。二者虽都一词之易,那言不由衷的良苦用心却尽在其中。在该书的刻印过程中,徐继畲的同乡好友、地理学家张穆见他将《皇清一统舆地全图》置于亚洲地图之后深知其中利害,急忙致书,提醒他“本朝舆图必应挪居亚细亚图之上”,因为“春秋之例,最严内外之词”,所以谈“海外异闻”时“尤宜慎权语助,以示区别”,而明代的徐光启等人“止因未洞此义,遂尔负谤至今”。徐继畲立即听取张穆建议,将《皇清一统舆地全图》放在卷首。其实,他也深知介绍这些使“中国”不居中的地图的后果,因此又强调中国为“伦物之宗祖”,“万方仰之如辰极”。但这并不起作用,此书一出即腾谤议,群情汹汹,攻击他“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一意为秦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在痛遭诋毁之后,此书不久被遗忘。但这毕竟是中国人“世界观”即将转变的嚆矢,标志着启蒙时代已经来临。

19世纪末,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而一幅至今仍不知其名的忧时之士所绘的《时局图》对人们奋起救亡的作用之大,令后人难以想像。图中以熊喻俄国,侵吞中国北部;虎喻英国,占据长江中下游;突然变粗的虎尾喻德国,横扫山东;鹰喻美国,正从其殖民地菲律宾扑向中国;太阳喻日本,侵占了台湾;蛙喻法国,侵入两广和云南。列强虎视眈眈,正在瓜分中国,而清朝官员却依然文恬武嬉,高枕无忧。除一些地名外,图旁只有“不言而喻”四字,但“俄北瞰,英西啖,法南瞬,日东眈”,中国面临的这种虎视鹰瞵、瓜分豆剖、亡国之祸迫在眉睫的危急局面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却被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小小一图搅动无数人心,被广为刻印登刊,其影响胜过许多慷慨激昂的长篇大论。这,就是“地图的力量”。

若把一些城市的“历史地图”前后对照,更使人不胜今昔之慨。哈同路、霞飞路、赫德路、贝当路、林肯路、福开森路、魏德迈路、爱多亚路、金神父路等等变为铜仁路、淮海路、常德路、衡山路、天山路、延安路、瑞金路……诉说着大上海的世

纪风云。王府井、演乐胡同、粉子胡同、贡院街、国子监、夫子庙、中山路、中山大道、民生路、民权路、二七路、张自忠路、光复路、斯大林大街、斯大林广场……每个城市都有不同时代留下的标志。“文革”风暴突起，一夜之间城市路名被改泰半，查阅那时的地图，东方红大道、卫东路、革命路、反帝路、反修路、文革路、立新路、四新路等等无论哪个城市都比比皆是，充分反映出那个时代“突出政治”的特点。而查看现在的地图，便会发现一些交通要点都以大企业、大公司命名，如联想桥、四通桥、长虹桥、燕沙桥等等，甚至一些公共汽车站名也改以附近的大商厦、大酒楼命名，颇显“工商”财大气粗、睥睨一切之势；金钱的作用和力量猛增，透露出社会正在转型的信息。

幅幅地图默默无言，却几乎是我们政治、社会生活演变过程的显示卡，其中凝聚着无限的历史风云和岁月沧桑，供人细细解读、反复体味。

『公园』的意义



举世皆知，中国园林可谓历史悠久、美不胜收，但不是官家园林就是私家花园，从无“公园”。现在我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公园”，是在近代西学东渐影响下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的。

公园首先于 1868 年出现在上海的租界，由租界当局“工部局”用中外商人税款创办，中国人译名为“公家花园”，几十年后留日学生增多，才从日本引进、最后确定名为“公园”。“公家花园”的出现，使国人对这类“公共”有初步认识。对中国人来说，“公家花园”毕竟是个新鲜事，所以时有在公园内攀折花木的事情发生。不料工部局却以此为借口，禁止华人入内。这种明显的种族歧视，自然引起华人的不满和愤怒，一些外国人也对此感到不平。《申报》发表了一些中外人士的文章，对此提出批评，如《请弛园禁》一文写道：“上海与香港事同一律，弛于彼而禁于此，抑独何欤？况该花园建之时，皆动用工部局所捐之银。是银也，固中西人所积日累月而敛聚者也，今乃禁华人而不令一游乎？窃愿工部局一再思之。”后来，一些著名华商一再请愿，联名致函工部局，要求废除这一不合理的规定，得到社会广泛支持。《申报》发表《论华商函致工部局请准华人得共游公家花园事》的评论文章指出：“本埠之有公家花园也，造之者西人，捐款则大半出自华人。西人于造成之

后，名之曰公家花园，以见其大公无私之意。然名则为公家，而其实则仍系私家。”因为不准华人人内则“此事似于公家两字显有矛盾。盖华人苟有执以问西人者谓：公家花园之创，与夫平时管理、修葺一切等费，皆出自西人乎，抑出自华人乎？以工部局所捐之款计之，华人之捐多于西人者几何？则是此园而例以西法，华人断不致被阻”。迫于各种压力，租界工部局不得不在 1886 年 5 月废止此禁，对华人开放此“公家花园”。

在近代中国的激荡风云中，这可能说不上是大事，但意义却不能说小。首先，这毕竟是反对殖民者种族歧视斗争的一个胜利，对绅商市民民族意识的觉醒有着相当的积极作用。其次，“公共空间”观念强调“公共空间”为公共所有，任何人的进入之权都不能被随意剥夺，也不能被强权任意强占，这种观念在中国向来薄弱，此事对国人“公共”意识的增强作用尤大。第三，只强调纳税义务，但不注重纳税人权利也是中国传统，这次中国绅商市民恰恰是“例以西法”，以“纳税人的权利”作为斗争的一个最有力武器并取得胜利，对纳税人权利意识的自觉所起作用尤其不能低估。当然，各种有关民族意识、公共意识、纳税人权利意识的理论和宣传文章对这些“意识”的觉醒所起的作用也很重要，但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升斗小民”来说，诸如“公家花园”的准进与否这类具体小事或许更重要。因为他们不是通过抽象的理论说教被灌输，而是通过与自己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琐事”，通过生活实践，通过维护自身权利的具体斗争，不知不觉、自然而然、活生生地感受，体会，认识到这种种“意识”的。这样的觉醒，这样得到的知识，往往更感性、更鲜活、更亲切、更持久、更深入，也更深刻。

大约在 20 世纪初，中国各地都开始兴办公园，在“官权”远远大于“民权”的传统中国，兴办公园还是得益于官方的提倡。1905 年，清廷为“预备立宪”派端方等五大臣到欧美诸国“考察政治”，他们到了欧美十余个大小国家，但给他们印象

最深的却是所到之处，国无论大小，公园、动物园、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设施都非常普遍。对他们来说，这可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所以，他们回国后呈送的奏折中不仅有“政治”，而且还对欧洲诸国的这类公共设施赞不绝口，一一介绍，认为是“专为导民而设”，“良法美意，为中国所宜行”。对公园，他们盛赞“各国城市村镇亦皆无不有之”，“都人士女晨夜往游，其空气既可养生，其树艺亦可资研究”。所以他们详细介绍了所见欧美诸国的公共设施后叹曰：“中国以数千年文明旧域，迄今乃不若人，臣等心实羞之”，盼朝廷“敕下学部、警部，先就京师首善之区，次第筹办，为天下倡。妥定规划之方、管理之法。飭各省督抚量为兴办，亦先就省会繁盛处所，广开风气，则庶几民智日开，民生日遂，共优游于文囿艺林之下，而得化民成俗之方，其无形之治功，实非浅鲜”。此后，公园等公共设施开始陆续兴办，并日渐成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但男女同时游园，深违中国“严男女之大防”的传统，被一些人怒斥为大逆不道。为减小阻力，主事者不得不作出必要的妥协，因此初办时大多数公园都有男女只能分单双日分别游园的规定。但既然提供了公园这样一个“平台”，实际就无法阻止“男女同游”，所以有关规定不久就被冲破，成为一纸空文，社会也容忍、认可了男女同时游园。公园，对社会风气的开化，作用也着实不小。

包括公园在内的“公共空间”在近代中国的扩展，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意义不菲。但公共空间的维持并不容易，如时时发生绿地被毁、马路被占等等。因此，对公共空间的悉心维护与奋力拓展，是每个公民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赛先生』旅华记



“科学”(science)在五四时期被尊称为“赛先生”，在中国思想界突然“风光”起来，若从1583年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东来，将近代科学知识带入中国算起，“赛先生”旅华经三百余年。不过这三百年间，“赛先生”在中国的遭遇却真是时乖命蹇，一波三折，一度还几乎被“驱逐出境”。“赛先生”这种极富戏剧性的命运，却也反映出这三百年间中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变化。

明朝末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人来华传教时遇到不少障碍，首先就是用三棱镜、自鸣钟等中国人从未见过的奇巧之物打通一些重要“关节”。由于传教一直受到限制，他们便长期以“合儒”、传播近代科学知识作为吸引中国一些士大夫的策略。经过不懈努力和与徐光启等一些中国士大夫的合作，他们将地圆说、世界地理、欧氏几何、近代历法（即今日公历）等译介进来，“赛先生”便这样阴错阳差地首次来到中国。不过，徐光启等中国士人此时还是用中国传统的“实学”、“格物穷理”等概念来称它。当然，“赛先生”也遇到强烈的反对，如不少人认为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中中国未居世界之中是“邪说惑众”，“真所谓画工之画魑魅也”。对日食的预测等经验证明公历优于中国传统历法，由于这关系到皇家祭祀的大事，明末以此为基础编成《崇祯历书》，为清初颁布《时宪历》

做了准备。但“修历”引起的反对更强大，反对者认为传统历法是古圣先贤定下的万世不易之制，若修改此法，则整个文明将“以夷变夏”。康熙末年因礼仪之争引起清廷“禁教”，到雍正时干脆“禁学”，“赛先生”被逐出境。此时，世界近代史上的第一次科学革命已经完成，科学技术正在突飞猛进，中国与世界联系仅有的一丝门缝反被关上。中国，令人遗憾地丧失了与科学的第一次机缘。

一百多年后，“赛先生”随西方的船坚炮利第二次来到中国。“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林则徐等少数“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对科学技术的力量有了粗浅的认识。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介绍了西方的军事技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却遭到群起攻之。守旧者认为西方的“长技”只是“奇技淫巧”，师此“长技”有辱中国的“圣道”，是“溃夷夏之防”。只是到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从根本上危及满清统治者之后，统治者才不得不办“洋务”，学习西方“长技”。说来也真好笑，这本是对统治者“有百利而无一害”之举，却遭到了统治者内部的强烈反对，使中国第一次较大规模学习近代科学技术的“洋务运动”处处受阻，进行得极不顺利。要制造现代化枪炮军火当然要学习现代的自然科学知识，培养有关人材，所以在洋务派的推动下，奕訢于1866年提出将原本只学外文的同文馆也招收“科甲正途”出身人员学习天文算学，却遇到了以大学士倭仁为代表的强烈反对。反对者认为“天文算学，止为末艺”，“即不讲习，于国家大计亦无所损”，并进一步指责这是“师事夷人”、“师敌忘仇”，必定会“大伤风教”、“忠义全消”。在严讲“夷夏之防”的传统社会中，这可是严重的“政治罪名”。后来，朝廷出面平息了这场争论，但报考人数寥寥，更少“正途”出身人员，科学技术知识的“正当性”仍不被承认。后来的建轮船、修铁路、架电线都遇到强烈反对，引起长期争论。1865年，一位英商在北京铺造一条长约一里的铁路，试行小火车，结果“京人诧为妖物，旋经步军統領饬令拆卸，群疑始息”。70年代初，洋务派提出修建铁路，未获